

政党价值观是深化政党研究的新视角

石国亮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北京 100089)

摘要:对于政党价值观的研究,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事实上,政党价值观是构成政党形成和发展的基础,是深化政党研究的新视角。这是政党研究演进的逻辑必然,是对政党兴衰成败史反思的必然结论,也是西方发达国家政党自身变革的重要启示。

关键词:政党;政党价值观;新视角

中图分类号:D2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9)05-0025-05

研究政党价值观,实质上是从价值观的角度解读政党。袁贵仁、韩震教授在其主编的《新世纪的中国共产党价值观》一书中指出:“世界上的政党,无论是资产阶级政党、民主社会主义政党,还是无产阶级政党,从形成之日起,毫无例外都有自己的价值观。人们只有在价值观上取得认同,形成一致,才能走到一起,才能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成为政党。”^{[1]3-4}这一段话,不仅对政党价值观的客观存在作了论证,也很好说明了价值观在政党形成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笔者也曾撰文,从正功能、反功能和潜功能等三个层面,对政党价值观的功能进行了详细探讨^[2]。那么,为什么说政党价值观是深化政党研究的新视角呢?本文着重从政党研究的演进、对政党兴衰成败史的反思和西方发达国家政党的自身变革等三个方面进行了探讨与回答。

一 政党研究演进的逻辑必然

鉴于政党的重要地位、作用和影响,从政党产生之日起,学界从未停止过对政党的讨论和研究。欧美不仅是政党产生最早、政党政治最为发达的地区,

同时也是政党理论研究最早、有关政党的研究成果最为丰硕的地区。对西方学者对政党的研究,可以从两个角度来加以概括。一个是研究内容和方法,主要集中在政党组织、政党与意识形态两个方面,方法也主要是围绕着这两个方面展开的^[3]。另一个是研究的历史进程。林勋健为当代西方政党研究译丛所写的《总序》,将西方的政党研究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20世纪以前,西方已经有学者对早期的宗派和党派进行研究,主要集中在党派的作用、党派与派别的关系等方面,研究工作从总体上看还比较零散和肤浅,政治学界对政党的研究还不够重视;第二个时期,20世纪上半期,政党现象受到某些学者的重视,研究工作不断深化,并出现了若干研究政党的专著;第三个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的政党研究进入一个全面、深入发展的新时期,出现了对政党的意识形态的研究,如对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第三条道路、民主社会主义、绿党等的研究^{[4]7-8}。

不难看出,上述两个角度都涉及到了政党的意

收稿日期:2009-06-02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论政党价值观”(ZBJ@ 04036201)的最终研究成果之一,是作者博士后研究报告《论政党价值观》引论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导师为教育部副部长袁贵仁教授。

作者简介:石国亮(1972—),男,安徽芜湖人,法学博士,哲学博士后,副教授,美国丹佛大学访问学者,主要从事政党政治、政府政治和青年政治研究。

识形态。由于意识形态的核心是价值观问题,因此研究政党的意识形态必然要涉及到政党的价值观。政党自产生之日起,它就成为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是代表特定阶级、阶层和集团利益的政治组织,其基本功能就是反映和表达一定阶级、阶层、集团的利益、愿望和要求。政党要反映和表达特定阶级的利益、要求,必须体现和接受反映这一阶级的思想观念,并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这就是政党的意识形态。政党意识形态是一个政党在成立之时提出并在长期活动中形成的一套价值观念、理论体系和是非标准^{[5]90}。意识形态对政党来说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任何政党的存在都以自己的意识形态为前提,从逻辑上说,先有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认同才可能有政党;另一方面,意识形态是政党的思想武器^{[6]235}。此外,意识形态是划分政党类型的重要依据和标准。上面提到的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第三条道路、民主社会主义、绿党等,实质上就是主要根据意识形态来划分的。应当指出,西方对政党意识形态的研究,涉及到了政党的价值观,但是还不完全等同于对政党价值观的研究。对政党价值观的研究,还没有明确提出来。如上所述,价值观是意识形态的内核,要深化对政党的研究,必须加强对政党价值观的研究。

那么,我国学界对政党的研究情况又是怎样的呢?我国近现代政党的发展历史,以孙中山先生创立的兴中会为起点,迄今已有 110 多年。在这一个多世纪中,我国学术界、出版界在不断研究和总结本国政党发展的实际经验的同时,也持续不断地翻译出版了有关国外政党的一些著作。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各项工作逐渐步入正轨,学界对政党的研究进入一个新的时期,研究领域不仅涉及到中国共产党,涉及到世界其他政党,涉及到执政党的建设,还涉及政党理论和政党政治。这一时期,比较研究的方法引入了政党研究,取得了积极的成果。由于党和政府的重视以及广大理论工作者的辛勤努力,我们在政党的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从微观上看,对政党的概念特征、制度规范以及政党变化发展的历史轨迹和规律等都有了比较全面的介绍;从宏观上看,对世界上不同的政党进行了总体考察和描绘,特别是从横向上对不同的政党进行比较研究,使人们更容易区分政党的差异性和特殊性,更好地把握各个政党的本质和意义。

特别是提出了政党价值观研究的新课题,大大深化了政党的研究。研究主要是针对政党的某种价值观或者某个政党的价值观进行的具体研究和探讨,包括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观、资本主义政党的价值观、世界上“老大党”价值观以及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等其它政党的研究。由个别的、具体的研究必然引发人们进行一般意义上的抽象和思考。有学者以哲学思维和世界视野,从宏观的层面上探讨了一般意义上的政党价值观,包括什么是政党的价值观、政党价值观的功能和作用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袁贵仁、韩震主编的《新世纪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观》,该书的序言对政党价值观进行了整体性概括和介绍;李斌雄在其专著《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观研究》^[7]也对政党的价值和价值观进行了一般性的探讨。有的论文对政党价值观的基本问题也有所论及^[8]。

不过,相当多的研究都是从政党的发展历史、制度规范、政策措施等方面探讨政党价值观的,也就是说,主要通过对政党这些方面的研究来说明和反映政党的价值观,缺少对政党价值观专门而深入的研究。这是其一。其二,针对某个政党或者某种价值观的具体研究较多,尤以研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的成果为多,而从一般意义上对政党价值观进行整体性研究甚少,可谓凤毛麟角。其三,虽有论者从一般意义上对政党价值观进行开拓性的探索,但仅仅是提出了问题,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更多的情况是,在进行具体研究或个案研究时,为了论述的需要,首先从一般意义上简要说明政党价值观的基本理论,而很少从整体上对政党价值观进行专门研究,尚未出现从整体性研究政党价值观的专著。这说明,目前政党价值观研究的整体水平不高、创新程度不够。提升政党价值观研究的学术含量,拓展研究的学科视野,有待我们作出更大的努力。

二 对政党兴衰成败史反思的必然结论

回首刚刚过去的 20 世纪,有许多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值得回味和反思。就政治视角来看,值得任何政党及理论家深刻反思的一个重大问题是:为何一些政党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革命胜利,建立了政权,并在建设过程中取得了不小成就,但当历史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这些长期执政的大党老党,像前苏联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印度国大党等,却又纷纷丧失政权,这不能不引发人们深刻的反思。由此,学者们提出了这样一些

问题:作为物质运动基本规律的“周期律”对人类历史发展与社会变迁是否适用?政党的兴盛衰亡是否也受“周期律”的支配?

从思想史的演变来看,长期以来,东西方无数智者和哲人对社会历史的变迁是否有规律,这种规律是否客观,是否可以改变,一直争论不休,可谓众说纷纭,见仁见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世界上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有规律可循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也不例外,它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不断由低级向高级演进的,这一总趋势是任何力量都改变不了的。因此,不可能设想,今天发达的人类社会,经过一个什么周期,又回到远古时代去。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社会的发展不受历史“周期律”的支配。但这并不排除在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和大前提下确实存在历史现象的某些“个别倒退”,有时甚至是周期性重演。就此而言,“历史周期律”确实存在。正如1945年黄炎培先生在访问延安时与毛泽东的谈话所言: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律^{[9]610-611}。纵观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王朝兴盛衰亡的历史,就是对“历史周期律”现象的最好实证注解。中国封建社会每个王朝的平均寿命为200年左右,最长不超过300年,其中前第一、二代统治的五六十年是稳定发展时期,而从第三、四代开始的后一百四五十年则是停滞、腐败、灭亡时期,中国封建社会就这样周而复始地行进了2000多年。

其实,这种“周期律”现象不仅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存在,就是在近代、现代、当代世界政党政治上也屡见不鲜。近代以来,一些政党执政的时间大多也是六七十年,不过两三代人的光景,之后往往会发生转折。上文提到的前苏联东欧共产党、印度国大党、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等政党,都没有跳出历史“周期律”的支配。由此可见,如同其他任何事物一样,政党的发展也是有规律可循的。遵循规律,就能持续健康发展;违背规律,就难免“兴勃亡忽”的结局。

反思并深入研究这些性质不同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可以从不同的视角进行分析。但从根源上观察问题,就会看到,是这些政党自身出了问题,

是这些政党没有正确认识“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因而没有从价值观上解决好“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这个根本问题。一般来说,这些政党大都经历了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过程,但同时又是由代表大多数人利益的党向代表少数人利益的党蜕变的过程。特别是在执政的中后期,党内存在严重的腐败问题,形成了特殊利益集团,不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而最终被人民所唾弃。1991年苏联解体前,苏联社会科学院作过一次调查,被调查者认为苏共代表工人的占4%,认为苏共代表人民的占7%,认为苏共代表全体党员的占11%,而认为苏共代表党的官僚、代表干部、代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占85%^{[10]67}。因此,当戈尔巴乔夫宣布苏共解散时,广大人民群众一个个表情冷淡,无动于衷,说明苏共已完全失去人民的信任和支持。在苏共垮台10年之后,戈尔巴乔夫本人的一段话很耐人寻味:“最关键的是不能失去人民的支持。这对我,对你们,都是一种教训或启示。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就失去了主要的资源,就会出现政治冒险家和投机家。这是我犯的错误的,主要的错误。”^[11]由此,人们就不难理解苏联人民为什么那么平静地接受了苏共垮台这样一个严酷现实。这些政党丧失历史地位完全是“自杀”而非“他杀”。这些政党丧失执政地位的原因有千条万条,但最重要的一条是脱离了人民,失去了民心,背离了民意。

与上述老党、大党相反,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那天起,就不仅代表着无产阶级的利益,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而且根据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发展,不断探索和深化对党的价值观的认识,不断加强和改进党的价值观的建设,保持了党的价值观的先进性。就其做法和经验来讲,主要包括:坚持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理想和现实的有机统一,坚持从思想上建党,科学认识党的领袖人物的价值观与党的价值观的关系,正确处理党的价值观与其成员价值观的关系,准确把握党的价值观与社会价值观的关系,正确对待党的价值观与青年一代价值观的关系,总结和借鉴世界上其他政党价值观建设的经验。当然,这不是说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观建设不存在问题了。对于一些老党、大党衰败的情况,江泽民、胡锦涛等就不止一次指出,要认真分析这些政党的兴衰,加以借鉴^①。更何况,随着党的价值观建设实践的发展,党

的价值观建设也要与时俱进。

正反两个方面的事实告诉我们,政党价值观的正确与否,是决定政党兴衰成败的一个根本性因素。当前,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多极化的逐步推进,世界范围内思想文化的交流也日益频繁。同时,世界思想文化领域出现错综复杂的新情况,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日趋激烈,价值观的激烈冲突和深刻变革成为一种世界性、时代性的思想文化现象。这些新变化,必然会反映到政党的价值观建设之中。在这种背景下,世界各政党无论其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如何,无论其本身处于怎样的社会制度中,也无论其赖以存在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如何,都普遍表现出对价值观的关注。因此,深入研究政党的最高价值观,把握政党建设的制高点,就成为各种性质不同的政党进入新世纪后所面临的共同课题,也成为政党研究的重要任务和新视角。

三 西方发达国家政党自身变革的重要启示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老党、大党相继丧失政权,加之各国政党格局的新的变化,引发了世界政党政治变革的新潮流。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执政党逐渐打破传统框框的局限,相互借鉴执政经验,大力加强自身变革。包括:扩大政党纲领和政策的包容性,促进政党的长远发展;努力争取选民,扩大政党的社会基础;不断扩大党内民主,提高党的形象和吸引力;改革传统的组织机制和活动方式,完善政党的运行机制等等。从这些调整和变革的措施来看,重点是政党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调整和变革。

一般来说,一个政党,通常有着其独特的纲领和政策,以往政党总是力图通过提出不同的政策来争取支持者。当历史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情况已大不相同。除了上文提到的世界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发展以及政党格局的新变化之外,西方发达国家执政党面临着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困境。究其原因,一是政党价值观与社会价值观之间的距离。政党是代表一定阶级、阶层和集团利益的政治组织,其价值观是社会整体利益的高度抽象,是一元化的;而社会价值观是社会不同成员和利益群体根据自己所处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地位的生活体验,对事物进行的判断和认识,是多元化的,这中间有着天然的距离。二是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距离。政党价值观的凝聚力和号召力,原本源自它对现存社会的批判和改

造社会的美好计划。人们信仰特定的价值观,追随代表特定价值观的政党,是因为他们相信,如果政党改造社会的计划得以实施,社会将变得比现在美好得多。但是,政党政治发展的现实表明:不管一个政党的价值观境界多么崇高,一旦成为执政党,就会经常遭遇“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的局面。三是政策转向的困难。政党为实现意识形态的价值目标而制定的政策,在执政实践中由于各种复杂情况的出现常会遇到问题,需要改革和调整,为了解决问题,改革和调整可能出现与价值观的脱节,这种情况不仅会引发党内的价值观纷争,也会导致民众的不满和政党及政策承诺危机。四是人们的价值取向和个性化要求越来越多。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技革命的日新月异,中间阶层的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传统的资本家和工人阶级的数量则逐渐减少。这种社会结构的变化导致政治上的一个结果,就是社会职业和政治观点之间、利益和价值观之间的联系日益疏远,过去那种工人拥护社民党、资本家拥护右翼政党的大分野变得模糊起来。同时,人们受教育的水平越来越高,价值取向和个性化要求也越来越多,对某一政党“从一而终”的固定选民不断减少,依政党政绩而改变投票意向的“流动选民”正不断增加。

由此,执政党想靠价值观来凝聚人心变得越来越困难。面对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困境,各类政党都在寻求应对的措施,进行价值观和政策的调整。如调整本党的政策,对原有的理论体系、思想观念进行修改、补充,吸收其他政党的主张、政策等。从总的趋向看,对意识形态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努力向中间靠拢。西方发达国家政党根据自己的党情、国情,采取了一些措施。其做法大致有以下几类。其一,摆脱传统理论的教条,适时地进行理论创新。如1995年布莱尔领导的英国新工党为了上台执政,修改了党章第四条被看作是英国工党图腾的“公有制”条款,随后为应对全球化,提出了完整的“第三条道路”理论。其二,调整党的纲领和主张,逐渐扩大政策的包容性。西方国家执政党逐步打破传统框框的束缚,其纲领和政策体现出越来越强的包容性。一些典型的资产阶级政党打出了维护劳动者社会福利和公民权利的旗帜,使其价值观带有较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比如,西欧多数社民党强调要成为“群众性的纲领党”,在“基本价值观保持不变”的前提下,纷纷对党进行变革和调整。德国社民党认为要重新

理解“自由”、“公正”、“互助”基本价值观,连极右的意大利民族联盟也提出了“民主革新”向“民主的、温和的右翼”演变。其三,在动员民众时,弱化意识形态的色彩。为了执政,努力把意识形态的观念转化为民众能够接受的政策。如美国的两党通常被认为是“非意识形态化”的政党。事实上,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谱系看,美国两党意识形态的渊源和歧见是很深的,政党的核心部分也是非常意识形态化的,只是他们在动员民众、争取选民时,既不进行意识形态的宣传与鼓动,也不进行意识形态的争论和攻击,而是把意识形态的观念转化为对选民关心的具体问题的看法和解决问题的政策,并从中体现出政策的灵活性。其四,实行“拿来主义”,兼收并蓄。美英等发达国家执政党常借助“思想库”、“智囊团”制定政策,相互借鉴和渗透,导致一些内外政策日益趋同。英国工党和保守党在国有化问题上本来是完全对立的,但从20世纪80年代起保守党开始改变看法,承认一些部门的国有化是必要的,在20世纪90年代

工党则放弃了其一贯坚持的国有化立场。在美国,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本来是民主党和共和党各自的政治信条,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这两个党的界限变得十分模糊。两党都强调要进行改革,在迫使各国开放市场、对中产阶级减税、强调人权等许多内外政策主张上趋向一致。环保主义是绿党的意识形态,在欧洲它发展迅速,影响甚广,鉴于此,传统大党也立即对生态学表示兴趣,并把环保主义者的要求纳入政策考虑之中。实际上,在现今执政党的政策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左右融合。这样,各政党在一些内外政策上日益趋同,所谓“中间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了。上述政党价值观的调整和变革,为促进西方发达国家执政党的自身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其经验和做法也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一些有益的启示。若从政党研究的角度来说,则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深化当代政党研究,必须关注政党的价值观。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把握政党及其发展动向。

注释:

①如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九十年代以来,一些执政几十年的政党先后下台,有的已经衰亡。其中的根本原因是党的内部出现了问题。认真分析这些政党的兴衰,加以借鉴,对我们加强党的建设很有意义。”(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72页)又如胡锦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集体学习时指出:我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水平与其他国家不同,对世界上其他政党执政的一些做法和措施,我们不能照抄照搬;但对它们在治国理政方面的有益做法,我们要研究和借鉴,以开阔眼界,打开思路,更好地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大格局中把握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规律(参见《胡锦涛在建党83周年前夕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认真总结执政能力建设经验大力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人民日报》2004年7月1日)。

参考文献:

- [1]袁贵仁,韩震.新世纪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观[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 [2]石国亮.论政党价值观的功能[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5).
- [3]王军.西方学者政党研究方法论管窥[J].社会科学论坛,2002,(5).
- [4]林勋健.总序[C]//〔意〕萨托利.政治与政党体制[M].王明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 [5]王长江.政党的危机——国外政党运行机制研究[M].北京:改革出版社,1996.
- [6]王邦佐,等.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 [7]李斌雄.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观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 [8]石国亮.政党价值观研究的回顾与前瞻[J].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2).
-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83—1949:中[M].北京:人民出版社等,1993.
- [10]黄苇町.苏共亡党十年祭[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2.
- [11]李永全.戈尔巴乔夫访谈录[J].科学社会主义,2001,(2).

[责任编辑:凌兴珍]